

一部頗具特色的外交學研究新作

——讀周永生教授著《經濟外交》

◎ 陳奉林

近些年來，中國學者對外交學研究的重要方面——經濟外交進行了積極探索與開創性研究，推出了一批比較有水準、有影響的著作，成為當前沸沸揚揚的外交學研究熱景象之一角。在這些有影響的著作當中，應該提到的有北京外交學院周永生教授撰寫的《經濟外交》（此書係外交學院外交學研究叢書，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下稱《外交》）。它的出版，為國內讀者了解經濟外交發展的歷史與現狀打開了一個窗口。這是一部全新的實用性很強的學術著作。說它新並非誇大，因為它是作者對近年來國際形勢與科技發展總趨勢的深入思考，無論使用的材料、思考的角度還是分析的框架，都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基本上反映了目前國內經濟外交研究領域的水準和動向。在當前外交活動全球化、經濟化，世界大國已由過去的政治、軍事的對立轉向以經濟與科技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競爭的情況下，開展這一問題研究實在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外交》由九章構成。以宏觀視角縱向考察戰後經濟外交發展的來龍去脈以及經濟與外交的關係，是這部著作的最大特色。作者指出：「經濟外交是關係到國家經濟發展，關係到國家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關係到國際經濟協調、世界和平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外交政策和行為」（〈序論〉第1頁）。作者力圖構建一種新的外交研究的理論框架，用跨學科的和比較的研究方法，「以點和面相結合的方式，對經濟外交進行全面的理論研究和探討。」（〈序論〉第5頁）雖說經濟外交研究並非自《研究》始，但作者所關注、所強調的經濟外交對國家重要性的觀點，正是我們今天所應擴大和加強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沒有把經濟與外交離析開來，而是把經濟與外交作為一個水乳交融的一個有機整體進行研究，看作是經濟外交是政治外交的有益補充，「能夠為本國獲得經濟、政治、安全等多重利益」（第32頁）。作者十分關注戰後世界形勢發生的新變化，看到世界政治力量多極化、世界經濟地區性集團化同時在發展，世界發達國家分割世界市場的新形態。在這種形勢下必須給經濟外交以足夠的重視。作者關心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外交的表現形態、作用與運行機制，經濟外交對當今國家發展戰略的影響，經濟外交與國家利益、國際政治經濟的關係，中國經濟外交的重點，經濟外交與全球化，中國的歷史性機遇與挑戰等等。這些問題直接與各國發展利益相聯繫。作者在該書中並沒有對經濟外交進行理論性的學究式的探討，而是把它看作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必然的歷史過程。

長期以來，國內學者撰寫的外交方面著作一般都以政治外交為主，把經濟外交作為政治外交的依附性的點綴，把豐富多彩的外交活動砍削成乾巴巴的政治活動的面孔，寫得有骨有肉可讀性強的著作不多，即使是涉及經濟外交，也只是散見於一些著作的部分章節當中，並沒有把它作為重點研究。三年前我在《台灣研究集刊》2001年第三期中針對以往中日關係研究

（也包括日台關係）中存在的過於集中政治問題的傾向寫道：

在冷戰時代，中外學者多從不同的意識形態出發，研究的對象多集中在政治領域，使學術研究帶有深厚的意識形態色彩，把豐富多彩的國際問題研究變成為現實服務的政治說教。仔細觀之，從戰後到80年代末以前的論著，一般都以政治為主線，多集中在美日勾結侵略亞洲、日本帝國主義復活、蔣介石反攻大陸等問題上。這種研究是與整體思路的缺乏與過分強調意識形態的缺陷分不開的。冷戰結束後，中日學者不滿於這種舊的分析框架，注意從總體上來把握東亞歷史，逐漸淡化學術研究政治化的傾向，發揮唯物史觀理論與方法的作用，因此許多重要的國際問題被納入探索的軌道。

實際上，外交學研究中也存在這一問題，經濟外交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國內從事經濟外交研究的人不多，在研究中認識到這一點並努力加以改變的人屈指可數。至於超越傳統政治外交的視角，把外交研究擴大到政治以外的國際間重大經濟、文化、科技、軍事與人力資源交流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治經濟外交較政治外交難度為大，它不僅需要國際政治學的知識與視野，還需要經濟學理論與素養。擴大研究的視野，轉換研究的思路只不過是最近十幾年的事情。由此可以說，《外交》的出版給我們作了一個研究的範例，它所涉及的政治、經濟、歷史等學科的知識令人倍感興趣。像這樣外交與經濟兼治、中外兼顧、歷史與現實結合的研究並不是所有從事外交學研究的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誰隨便就能做到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窺出作者在不惑之年的辛勤奉獻。捧讀之余，筆者讚賞作者的學術眼光與魄力，看到他為此付出的巨大的艱辛勞動。

《外交》的另一個最大特色，在於它深化了對外交實踐的認識，提出了建立有關經濟外交理論體系的艱巨課題。從過去的情況看，人們把外交視為政治外交的習慣由來已久。遠的不說，就是在人們熟知的研究中外關係史卓有成就的張星烺、馮承鈞、向達、方豪等著名學者的著作中，經濟外交也不占主要部分。這說明人們對經濟外交的認識還沒有達到一個新的階段。相比之下，倒是周著《外交》富有探索性，擴大了學術研究的視野，使問題的複雜性得到更為具體、更為充分的反映。通過研讀，我們看到該書始終把對外經濟活動提到關係國家發展與安全的高度，突破了單純地研究國際政治活動的狹隘局限，看得出它明顯地高出流輩。正如作者所說：「近十年來，經濟外交是中國學術界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但由於中國在該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大多集中於研究日本。一些外交和經貿方面的著作雖涉及中國、其他國家的經濟外交或經濟外交理論問題，但基本一帶而過，或簡單介紹，或側重經濟外交的某個方面，至今尚缺乏全面、系統研究經濟外交的專著，沒有形成一個全面、系統的理論框架。」（〈緒論〉第4頁）有鑒於此，作者提出「建立關於『經濟外交』的學術框架與理論體系，為充實『外交學』這一新學科奠定基礎」的嶄新課題。與同類著作相比，該書無論在分析模式還是在認識的深化上，都顯示出明顯的進步。周著以其獨樹一幟的分析方法和生動活潑的探索形式引起讀者的重視。已故學者張之毅教授的一段評述，大體上反映了讀者的觀感：「相信本書能夠從外交、經濟外交、對外關係、國際經濟關係等多方面給讀者以啟發」，他把這部著作看成是「一部國際關係學創新的精品」（〈序言〉第3頁）。我相信廣大讀者在閱讀中會有切深的體會。

《外交》對於經濟之於國家利益、國際政治關係的分析富有新意，超過此前出版的幾部著作。在本書中，作者通過比較分析，提出了富有啟發性的見解，認識到「經濟外交具有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的功能。經濟發展了才使國家的政治安全得以維護。而一國的經濟外交，對本國的經濟發展十分重要」（第381頁）。經濟外交「對維護國家政治安全十分有益」是作者透徹考察所得，也是貫穿在本書中的一條主線。看得出作者是以極大的努力與熱情來研究政治

與經濟相互關係的。對於「外交—經濟」關係的闡述並沒有停留於表面的分析上，而是深挖隱藏在外交背後的物質動因，這就是作者所說的「不為人知的隱蔽性的一面」，也就是最終的決定性力量。按照我的理解，最終的決定性力量是一種根本性力量，它的發展變化從根本上決定著整個國家利益與國際政治關係的發展變化。這符合恩格斯所說的「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8頁）。行文不願重複的作者不厭其煩地強調經濟外交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自然有著很深的道理。

《外交》善於從眾多的問題當中提取對中國當今社會有重大影響的主題，從而在根本上把握中國外交的努力方向。這是它與眾不同之處。為此專辟「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經濟外交」一章予以具體敘述。在此問題研究上，該書深入細緻地探討了中國在亞太地區的作用、任務與努力方向，中國建設性的主張與做法，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外資源參與中國西部的大開發，抓住歷史轉折的關鍵機會加速發展自己等等。書中有關中國西部大開發的描寫具體生動，落落大方，自然得體，表現出作者在此問題上縝密周詳的研究意趣。在本章中，作者對於中美知識產權政策分歧的分析也是有見地的，指出：「美國不顧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所取得的快速進步，一味要求中國按照美國和發達國家的法律和法規以及商業習慣修改本國法律，這是不公平的，是美國經濟和司法霸權主義的表現。」（第451頁）中國與美國還在經貿領域進行了鬥爭。只有將中美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政策聯繫起來加以對比考察，方能準確地把握中美經濟關係的脈搏。該書探討的問題都是中美關係中十分重要而又棘手的問題。由此觀之，帶著強烈的現實感去研究問題，這正是《外交》寫作方法上的成功之處。

對全球化時代經濟外交的分析也是富有特色的。這個問題是經濟外交研究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一般的著作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相比之下，《外交》對此問題的態度是值得稱道的。作者看到，全球化的根本動力是經濟力，它穿透所有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壁壘，經濟力量的巨爪將複雜萬千、矛盾異常的世界所有國家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如果從更為廣闊的視角來看，近代以來歐洲殖民主義向外擴張時皆熙熙攘攘為利而來，又熙熙攘攘因利而往。資本主義發展是與軍事擴張和殖民征服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而擴張與征服的背後就是強烈的經濟動因在起作用。這在《外交》中有充分的體現。這個觀點雖不是該書最早提出的，但它用此方法解釋重大國際活動的動因卻是找到了認識問題的關鍵。「經濟的發展與聯繫已遠遠超出一國國界，形成以某一大國或區域為核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相互依存的經濟格局。」（第562頁）在闡述全球化時代的經濟時，作者將注意力集中在市場、技術、資本流動等對國家影響的重要性上，對此進行深入的剖析，指出：「各種經濟關係互相關聯、需要、互補、制約和影響不僅客觀上使經濟外交廣泛存在，而且，也使經濟外交有廣闊的施展空間。」（第549頁）作者以日常大量的廣泛的經濟外交行為作為具體剖析，有助於我們對當前外交活動的認識。值得一提的是，《外交》比較關注全球經濟競爭與合作問題，正如它所說，競爭與合作「都緊緊圍繞各自的地區利益、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其中，國家利益是競爭與合作的經濟外交目的的核心。」（第564頁）中國利用當前的國際形勢恰恰是實現本國利益的關鍵時期，該書用很大篇幅進行深入分析，顯得尤為難能可貴了。

本書對構築中國和世界經濟外交模式的探討是很獨特的，這些內容集中在第九章「經濟外交總結與展望」當中。作者提出了若干新的觀點，其中包括追求效益時重視雙贏，國家間要相互尊重、協調與合作，求同存異、理解與照顧大局，共同富裕、富而有德等等。與此相關，該書提出了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即「中國經濟外交在保證本國經濟效益和利益的情況下，

要注意讓對方得到應得的經濟利益，雙方都能從中獲得收益，使中國經濟外交成為一個雙贏的良性循環過程」（第616頁）。它語言平實、深入，與那些高腔大調的官樣文章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這個觀點對習慣於把外交看作是損人利己、單方面攫取利益的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個有益的補充，也符合當今時代競爭共處、合作互利的要求。該書對中國在當今國際社會中應該負起的大國責任的論述合理可行，指出：中國應該「在國際上，倡導共同富裕。世界經濟普遍聯繫和影響，一國或發達國家的獨富，不可能長久維持，只有使廣大發展中國家全體擺脫貧困，世界都能進入比較理想、祥和的發展狀態。在這方面，中國應該身體力行，在國內使全體人民脫貧致富的基礎上，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第638頁）。這顯然是當代中國外交研究中最有價值的問題，我希望有更多的像《外交》這樣的深入、平實之作。

以上是筆者讀後的一些感受。筆者感到，同任何一部著作一樣，《外交》也有自己的不足以至缺陷，突出地表現為作者在自己研有專深的領域潑墨頗多，而對另外的一些問題表現出相對的薄弱，敘述多於分析；還有對經濟外交的若干國際制約性因素的分析尚感不甚充分，是為美中不足。我承認我對經濟外交的認識是不夠的，現在急就章地給自己補課，通過仔細閱讀，我認識到了《外交》一書的價值。

陳奉林 1962年生，北京外交學院外交學系副教授，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東北亞史、東方外交史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七期 2006年2月28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七期（2006年2月28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